



左右搖擺的中國政治

盧永雄

引言

滴、答、滴、答……鐘擺由左擺向右，又由右擺向左，這一左一右的運動從未止息，中國的政治也像鐘擺一樣，一會兒擺向左，一會兒又擺向右，令你眼花瞭亂，鐘擺的運動紀錄著時光的足跡，而光陰亦在中國政治的左右搖擺中流逝。

要總結過去十年中國政治發展實非易事，早自一九七八年中共第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始，中國已樹立改革的旗幟，除了由農村逐步推展震撼人心的經濟改革外，政治方面亦展開了一些改革的嘗試，好像領導體制改革、黨政分開等，但在改革的進程中，

出現一次又一次的反覆，最惹人注目的是中共在八九年真鎗實彈鎮壓國內的民主運動，這些忽右忽左的運動使人更覺得中國政治難於理解，究竟中共在左搖右擺中，是否仍沿著政治改革的道路前進？左搖右擺的政治究竟受什麼因素驅動？我們能否對中國政治發展作出概略的預測？在回答這一連串的問題前，我們不妨先總結十年來中國的政治改革和其間的中間塌性倒退。

不完全的改革

中國改革主要源於對文化大革命的反動，一九六六年爆發的文革，帶來災難性的後果，大部份生

產活動停滯，全國陷入內戰邊沿，自七六年「撥亂反正」，打倒四人幫，到七七年鄧小平復職後，如何否定文革，怎樣重建新的社經制度，成爲中共高層要解決的最大問題；往後的政治改革亦主要爲矯正文革時代的政治失誤。

政治體制改革首先從中共黨內領導制度的改革入手，文革充分暴露了政治權力高度集中於極少數人的弊病，領導制度改革主要針對此一問題。一九八零年二月，中共十一屆五中全會決定恢復中共八大時設立的中共中央書記處，作爲中共中央政治局及政治局常委會領導下的日常工作機構。到八二年九月，中共十二大決定改黨主席制爲總書記制，黨中央只設總書記，不再設主席、副主席，總書記作爲政治局常委會的成員之一，負責召集政治局及其常委會的會議，並主持中央書記處的工作。

由於文革時期中共的權力高度集中在黨主席毛澤東身上，故此重新成立中央書記處，改行黨總書記制，實質作用是削弱黨領袖的權力，加強黨高層

的集體領導。

與黨領導體制改革相配合的是領導人事的調整，以鄧小平爲首的第一代革命家開始起用第二、三代較年青的領袖，培養他們成爲接班人，胡耀邦和趙紫陽便是在此形勢下走上中國政治舞台的前台。爲吸引高層老幹部引退，八二年九月中共十二大設立中央顧問委員會，以吸引那些聲稱「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老革命家退出前台。最高領導層年青化的工作到八七年初見成效，在是年十月中共十三大時，鄧小平、陳雲、李先念退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政治局和中央委員會，表面上實現了中共領導層的換班。

值得一提的是領導幹部年青化及廢除終生制的工作不單在黨中央展開，而是遍及各級領導，中共一方面定出限任制及高級幹部的退休年限，另一方面提出幹部四化，即年輕化、專業化、知識化和革命化。文革後平反的一大批老幹部，亦逐漸從各級領導崗位上退下來。

黨內領導體制改革無疑是中共的自我完善步驟，至於如何調節黨與政府的關係，也是政制改革的另一重要課題。七八年以前，政制高度集權，其中一種表現形式是黨完全取代政府。在社會主義國家中，黨領導政府、控制政府，理論上無可厚非，但問題是若果黨完全取代政府的行政職能，黨政完全不分，便造成黨組織臃腫膨脹，黨發揮不好領導國家的功能，政府的行政職能亦大大削弱，再加上缺乏相互制衡，自然錯誤頻生。

中國黨政分開的改革始於八零年，第一步是改變黨、政高層領導完全重覆的現象，八零年八月，按鄧小平的意見，在政治局討論通過了新的國務院組成人員名單，向五屆人大三次會議建議，當時身兼黨主席及國務院總理的華國鋒不再擔任總理職務，鄧小平、李先念、陳雲等一批老革命家不再兼任全國人大及國務院的領導職務；接著由上而下，改變黨領導幹部兼職、副職過多的畸形現象。

其後推行的黨政分工的改革，重新界定黨負責

制定路線、方針、政策，國家負責執行；八二年十一月五屆人大五次會通過新憲法，人大組織及國務院組織法，這些法律擴大了人大常委會的職權，增加行政機關及司法機關的權力。在加強行政機構的效率方面，在八二年至八四年，全國進行精簡機構的改革，削減國務院及各級行政機構中部份臃腫的部門。

八零年以來的黨政分工的改革雖有一定的成效，但亦受周期性的政治動蕩所干擾，當改革的號角吹得響時，行政、立法、司法架構的相對自主性便增加，當反自由化的冷風吹到時，黨的權力便大大上漲，黨的權力始終沒有納入受架構制約的軌道。

和黨政分開相關的政企分開、政社分開改革亦逐步推行，就政企分開，八四年十月中共十二屆三中全會，改變原來國營企業內實行的黨委領導下的廠長（經理）負責制，實行完全的廠長負責制，使廠長擁有企業生產經營的決策權和行政管理的指揮權。另一方面，黨亦逐步改變直接包辦社會職能和

完全控制社會團體的做法，過去在農村中人民公社完全包辦各種社會職能，八三年一月黨中央決定改革農村人民公社的政社合一體制，同年十月更決定建立鄉政府，實現農村中的政社分工。此外，黨亦略為減弱對社會團體的控制，加強社團的相對自主性。

若說黨領導體制的改革成效較為顯著，而黨政分工的改革已步履艱難的話，擴展民衆政治參與的改革使更縛手縛腳，唯一值得一提的是基層人民代表大會的直選改革，八三年二月，五屆人大常委會二十六次會決定，全國縣級或以下的人民代表大會的代表，由選民直接選舉產生，並引入差額選舉，而縣級以上的人大代表，仍係由下級人大間選產生。

以上簡述了十年來中國已進行了的政治體制改革措施，有關的改革可謂未竟全功，八七年中國領導表示要研究全面的政治體制改革方案，同年十月中共十三大亦開始拋出建立公務員制度的初步構想，但全面的政制改革固然因八九年的緊縮而胎死腹中，

已初步試行的公務員制度亦無寸進。（註一）

要客觀評價中國已進行的政改並非易事；我們先要找出政制改革的目標，然後才可以衡量已行的改革的成效；從中國高層領導的角度看，七八年後實行部份政制改革目標十分明顯，就是要扭轉文革時代政制的嚴重毛病，當年最高領袖（毛澤東）發動群眾，向黨及其大量領導進攻，結果共產黨飽受攻擊，國家陷入內戰邊緣，這種情況在社會主義國家中也絕無僅有，追源溯始，問題和最高領袖受挑戰的絕對權力關係至深。

了解中國高層改革的目標後，便更易理解改革的偏向，他們熱衷於黨領導體制的改革，加強高層的集體領導，他們亦有意從事一定程度的黨政分開改革，以扭轉文革時期行政機構虛弱的狀態，增加政府的辦事能力，但最高領導似乎無意將黨政分家到政府脫離黨控制的地步。至於增強民衆參與的改革，卻非最高領導作政改的主要目標，故此只進行了縣級以下人大代表直選這些較皮毛的改革，高層

領導對發展民主參與其實不無疑慮，他們愛把民衆爭取民主的行動，和文革中群衆被最高領袖發動的群衆運動相提並論，指之爲搞「大民主」，而大加排斥。

其實出現文革悲劇的主要原因之一，不是因爲民主太多，而正是缺乏民主所致，因爲民主正是要約制最高領袖的權力，引用杜爾（Robert Dahl）所設想的民主體制，就是要建立多元政體，容許政制中有互相競爭的政治力量（例如政黨），便是民主政制的精義所在。（註二）而中國已進行的政改主要是把極少數最高領袖的權力分散到較大的領袖集體去，但黨高層的權力仍不受約制，而黨對國家、以至黨對社會的權力亦不受限制。故此總括而言，中國政改距離建立民主政制固然相差十萬八千里，即使要矯正文革的錯誤也未竟全功，中共最高領袖的權力的確是分散了，但高領導層整體的權力仍不受約束，所以一個領袖錯誤引導黨國走向的機會降低，但大部份領導集體犯錯的機會仍然存在，八九

年「六四」事件中的高層決策便是一個好例子。

週期性的緊縮

七八年後新時期的政制改革固然並不全面，而且更受週期性緊縮的衝擊，冷風吹到，萬馬齊黯，近年中國政治便受這種一放一收的空氣所籠罩。

新時期最早的緊縮可遠溯至七九年，自七八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打出改革開放的旗幟後，雖然首先出台的是農村經濟改革，但亦提出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方針，營造了寬鬆的大氣候，直接刺激了民間政治參與浪潮，七八年首都逐步出現「北京之春」民主運動，在西單民主牆貼起一張又一張的大字報，要求當局加快民主改革，但當時的社會土壤未足以令民運茁壯成長，而政權亦急促地將正在萌芽的民運壓抑下去。

七九年一月中共召開理論工作務虛會，這原是一個顯示政治氣候寬鬆的會議，由官方引導理論界探討中國社會主義實踐的問題，討論時不乏突破禁

區之見；但會議到後期突然急轉直下，鄧小平三月時在理論工作務虛會上發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講話，提出要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無產階級專政、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和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明顯地，鄧小平為民運人士及理論家定出框框，以防這些人的要求逐漸超出老革命家所能接受的範圍。四項堅持面世後，客觀上成爲「改革開放」的反面，形成意識形態上的兩極。

隨後，中共在八一年、八三年、八七年、八九年，分別進行了四次不叫運動的整肅運動，以圖約制異端。八一年初，作家白樺的小說《苦戀》開始受到批判，批評者指《苦戀》帶出的訊息，實質上否定社會主義制度。到八一年七月，批白樺的行動提升到「批判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高度，鄧小平作了《關於思想戰線上的問題的談話》，反對文藝界、理論界的資產階級自由化傾向，這便是新時期第一次反自由化。

到八三年，思想領域再度出現寬鬆的契機，三

月馬克思逝世一百週年，當時的中共總書記胡耀邦提出要發展馬克思主義，變相鼓勵了理論家踏入傳統的馬克思主義的理論禁區。那時討論得最熱烈的是人道主義和異化問題，這是新時期一個大規模的理論論爭。幾年內發表了六百多篇論文，其中大部份認同人道主義和異化論。

在西方，異化論被認爲是一種對馬克思主義重新發現的理論，帶有理想主義及無政府主義的色彩。在中國，六十年代中共官方會大力批判異化論，在文革中更遭踐踏。八十年代理論界重拾人道主義和異化論，部份過去會反對異化論的理論家，也變成支持者，曾在六十年代出任中共宣部副部長的周揚便是一個好例子。他們經歷文革後，在實踏中看到社會主義政權的異化，他們渴求一種更人道的社會主義。但官方卻看到異化論有否定社會主義、否定黨的含義，所以在八三年十月，便號召「清除精神污染」，對支持異化論的理論界大加批判，也旁及其他「自由化」的理論，及社會上流行的通俗和

色情的書刊。這是七八年後第一個較具規模的批判運動。

清污開始時勢頭很猛，但由於中共高層對是否進行清污有不同意見，加上社會上抵制力強，所以後來亦不了了之。

八三年清污帶來的緊縮空氣，在八四年底已開始抒緩，到八六年更出現另一番新景象，八六年六月，鄧小平提出要進行政治體制改革，理論界對政改反應熱烈，探討政改的文章如雨後春筍般湧現，部份民衆對政制改革遲遲未出台的怒氣，逐步宣洩出來，終於導致八六年底全國各地相繼爆發學潮。

學潮始自安徽合肥科技大學，十二月五日數百名科大學生走上街頭，學潮迅即蔓延全國，上海、北京、南京等二十多個大城市，學生提出民主、自由的要求，大力鞭撻校園內外各種不合理現象，學生上街遊行，公開要求政府對話。上海、北京等地的學潮此起彼落，逐步激化。

隨著學潮蔓延擴大，中共高層的老革命家很快

就沉不住氣；北京市人大常委會在十二月廿六日公布遊行示威暫行規定，限令遊行示威應在五日前申請，否則即屬違法。官方顯然欲藉此壓制學潮。學生曾對最高領導人鄧小平有一定的期望，所以上海學生在遊行時拉起「小平您好！」和「小平您在哪裡？」的橫額。但現實中的鄧小平並不如此，就學潮問題，鄧小平在十二月三十日召見了幾位中央領導，發表了「旗幟鮮明地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講話，指學潮「是幾年來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的旗幟不鮮明、態度不堅決的結果」。他又說，「上海的群衆中傳說中央有個保護層，對是否要堅持四項原則，是否要反對自由化，也有兩種意見。因此，鬧起事來後，上海人也要看一看。應該說，從中央到地方，在思想理論戰線上是軟弱的，喪失了陣地，對於搞資產階級自由是個放任的態度，好人得不到支持，壞人猖狂得很。」他更說，「沒有專政手段是不行的，對專政手段，不但要講，而且必要時要用。」（註三）

鄧小平這篇講話，隨後成爲中共中央八七年第
一號文件下達，中央隨即採取強硬手段對付學潮，
禁止學生未經申請上街遊行。被認爲是學潮背後黑
手的劉賓雁、方勵之和王若望等還被逐出黨，而當
時的中共總書記胡耀邦被認爲要對學潮負責，被迫
下台。從八七年的學潮和第二次反自由化的經驗可
見，當抗議力量內少數知識分子擴散到較大範圍的
學生及民衆，活動由論戰變爲街頭運動後，中共高
層也毫不猶疑地採取更強硬的手段加以打擊，這個
假設在八九年得到進一步的支持。

八七年初反自由化之後，到十月中共召開十三
大，元老在政治舞台上正式引退，在中央委員的差
額選舉中，一向反自由化最力的鄧力群被擯出局，
加上會上中共正式提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初
步提出政制改革的方案，政壇上出現寬鬆的氣候，
一緊一鬆的循環正在不斷重覆。終於出現了八九年
的學潮及隨之而來的鎮壓。

八九年一月，方勵之上書鄧小平，建議爲紀念

建國四十年，大赦魏京生等政治犯。隨後掀起接二
連三的知識份子上書潮，成爲學潮的前奏，而前總
書記胡耀邦在四月十五日猝然逝世，更成爲震撼中
外的學生運動的催化劑。學生借悼念胡耀邦而走上
街頭，發展到佔據天安門廣場，學生從要求民主、
打倒官倒的口號喊起，到後來李鵬政府宣布戒嚴，
學生改喊打倒李鵬的口號；學生從和平示威開始，
最後被逼走上坐牢、出走，甚至死亡之路，中間自
有複雜的轉折，難以簡單說清。

但這次學潮無論從規模或社會影響來看，都比
八六年的學潮大有過之。八六學潮中北京數千學生
上街，已算當時最大規模的遊行，而八九學潮中卻
有數萬學生長期佔據天安門廣場；八六學潮並未掀
動太多社會反響，但八九學潮在北京等地卻已深入
民心，北京就曾有百萬人大遊行聲援學運。

翻天覆地的學潮帶來黨中央高層的分裂，政治
局常委會中只有總書記趙紫陽和常委胡啓立堅持以
較溫和的手段去疏導學潮，而包括總理李鵬在內的

其他政治局常委和在幕後操縱大局的老革命家，都認為要以鐵腕去對付學生，結果強硬派得勢，總理李鵬在五月十九日召開黨政軍幹部大會，宣布在五月二十日開始戒嚴，李鵬將學運定性為「動亂」，極少數人要否定共產黨領導，說中央要採取有力措施，旗幟鮮明地制止動亂。（註四）當時不少人認為這只是嚇唬人的話，但事實上，在六月四日，中共的確動用真鎗實彈，鎮壓參與民運的學生和群眾，隨後大量民運份子被捕下獄，為八九民運譜上染血的休止符。在中共動了鎗之後，還有人天真地希望鄧小平出來「撥亂反正」，他終於在六月九日露面接見戒嚴部隊，證明了他正是鎮壓事件的導演。

中國新時期的緊縮確是周而復始，越演越烈，從七九年壓滅民運，提出四個堅持，到八一年第一次反自由化，八三年清除精神污染，八七年第二次反自由化，八九年鎮壓學潮，基本邏輯一致，只緊縮的強度因應挑戰力的增強而不斷升溫而已。

無休止的循環？

八九年後，中國的政經改革都陷入低潮，但回頭看，要肯定經濟改革的成績易，要確認政治改革的成效難。特別是六四的鎮壓後，人們看到即是黨上、中、下層很多人支持或同情學運，但最高層仍可一意孤行，更使人懷疑中共的最高權力是否已受約制。若果答案是否定的話，我們只能說過去十二年只進行了皮毛的政治改革，七八年遇到的政治問題，到如今也未能完全解決，而中共是否仍能繼續進行根本性的政治改革，也確實使人懷疑。

很多人認為八九年的鎮壓出人意表，但當我們回顧七八年以後不斷重覆的一鬆一緊的政治路線，便應該明白六四鎮壓其來有自，縱然鎮壓的程度出人意表，但鎮壓本身卻非偶然。要探究中國政治的前景，不能不解開這個一鬆一緊政治循環的迷團。派系鬥爭的解釋最受歡迎，政策的左右搖擺，被視為改革派與保守派爭持的結果；（註五）但經

過事態發展的驗證，卻發現派系鬥爭分析傾向將問題簡化，而且要將中共高層領導準確劃分派別也非易事，例如過往不少人將鄧小平劃為改革派，但事實證明他雖然在經濟上是改革的先鋒，但在政治上卻是緊縮的旗手，很難把他劃歸某派。

值得一提的是，我們並非否定中共高層有派系、或者鬆散的政治聯盟存在，也不是否定在決策過程中，派系或政治聯盟發揮了不少作用，但派系鬥爭論顯然不足以解釋左右搖擺的政治循環。

另一個理論是「代」的解釋，「代」的說法在國內較為流行，有論者認為可以把中共的政治精英至少分成四代人，第一代人是首創革命的一代，第二代人是抗日的一代，第三代人是新中國的一代，第四代人是文革的一代。同一代人在成長階段經歷同一歷史經驗，對事物有較近似的看法。（註六）

「代」的觀點較能解釋中共高層理解政治挑戰時的差異，第一代人的意見頗為一致，對各種挑戰都有敏感反應，動不動理解為生死存亡的鬥爭，六

四前後元老陳雲的說話實在可圈可點，陳雲說：「人民共和國是經過幾十年的戰爭才建立起來的，用成千上萬革命烈士的鮮血換來的成就，有可能會毀於一旦，這等於對共產黨的否定。」而第二代和第三代的領導對政治挑戰的理解和回應便較為多樣化，雖然有部份人認同元老的觀點，但更多人是採取開放的態度。

文革的混亂過後，革命元老肩負重建國家的使命，他們希望建一個富強、穩定的中國，民主在他們的頭腦中佔不了幾許位置，他們既無意進行根本性的政治改革，他們把國家的成就視為這一代老革命家的遺產，但他們卻看不到經改和政改的連鎖關係，結果只能以強硬手段壓滅政治參與的要求。由於實質的政治權力最終仍握在元老之手，所以第二、第三代人在關鍵時刻根本起不到作用，反而是依附第一代領導的人才會起到作用。

「代」連系到繼承的問題，由於生理上的限制，第一代不得不選定自己屬意的繼承者，正如黎安

友 (Andrew Nathan) 指出，六四的悲劇在於中共政權和人民關係的危機，不幸地與中共內部的權力繼承危機交錯在一起，假如前中共總書記趙紫陽被允許利用中南海外的學運來為中南海內的權力鬥爭服務的話，總理李鵬以至元老們也害怕會被趙紫陽迅速清洗掉。(註七) 他們便立刻選擇貶斥不受控制的趙紫陽，並無情地鎮壓學運。

如果假設就政治問題，「派」的矛盾只是表象，「代」的矛盾更為深刻的話，可以推論關鍵的第一代領導人因生理因素而永久退出政治舞台後，中國才有較開明的政治。假設當時中國不出現分裂性的動亂和軍人沒有干政的話，中共高層將更能容忍挑戰，寬鬆的時候更多，緊縮的時候更少。但可以想象，雖然當時中國政治左搖右擺的幅度可能較少，但相信仍未必能完全擺脫那個一鬆一緊的循環，這除了因為政治權力集中、政策易受政治精英權力爭逐的影響外，更根本的原因是中國仍要面對發展的挑戰，改革只有模糊的目標，只能摸索前進，可能

經常是走三步，退二步，但這種搖擺和現在的循環的分別是，它是沿著改革的道路前進，而不是經常倒退。

註釋

一、要進一步了解中國已進行了的政制改革，可參看洪承華：「略論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政治體制改革」，王飛欣等編：《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政治體制改革的理論與實踐》，(北京：春秋出版社，一九八七)，頁十九至廿九。

二、可參看杜爾 Robert Dahl ed., *Regimes and Oppositions*,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3) pp. 1—26.

三、鄧小平，「旗幟鮮明地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增訂本)》(香港：三聯書店，一九八七年)，頁一三四至一三五。

四、李鵬，《人民日報》，一九八九年五月二十日，

頁一。

五、有關派系論較為理論性的研究，可參看 Andrew Nathan, "A Factionalism Model for CCP Politics," *The China Quarterly*, No. 53, (1973) p.44.

六、Vera Schwarcz, "Behind a Partially Open Door: Chinese Intellectuals and the Post-Mao Reform Process," *Pacific Affairs*, (Winter 1986-1987) p.586.

七、黎安友，「中國民主之展望」，《知識份子》，一九九零年冬季號，第五卷，第二期，頁廿一。



《特訊》漢陽聖高隆龐堂經過多年修葺，已於十二月十四日由涂世華主教主禮祝聖復堂。